



**欧洲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时候可能暗中强化了种族矛盾**，因为福利保障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就越突出。

越缓慢，经济危机越来越明显。”郑若麟说，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移民，一方面是非洲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失败，另一方面则是中东战事不断，产生了很多难民，逃亡到欧洲。

郑若麟指出，还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被认为是反犹的国家，犹太人在欧洲处于少数族裔的地位，也是种族主义所排斥的对象。今时今日，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一股左翼政治势力，希望引进外来移民，把欧洲变成一个混杂人种的社会。不但人种复杂，而且希望在文化上也变得多元化，大家享有同等权利，这样似乎就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雏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欧洲接受了大量的移民。问题是外来移民越多，经济发展就越困难。当然，两者之间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是当经济发展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底层劳动人民就容易把外来移民视为他们的威胁，他们的敌人。“这就是种族主义在欧洲日益发展，越来越激烈的主要原因”。

为此，西方学界有种观点认为欧洲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时候可能暗中强化了种族矛盾，因为福利保障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就越突出。特别是在近年来的欧洲难民潮下，欧洲福利国家的反移民、反种族主义就越来越明显。

## 反种族主义任重道远

事实上，许多西方政治精英并无意根除社会不平等的痼疾，甚至一些人本身就是“白人至上”的拥趸。对此，哲学学者项舒晨就认为，“没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存在。”

郑若麟也认为，西方人在种族问题、文化差异问题上，有着固有的、难以改变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又是在不断变化的。例如父亲勒庞是坚定的反犹分子，玛丽娜·勒庞则不反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大差别。但是在今日法国的历史书上或者媒体报道上却很难找到具体的描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微妙而特殊的现象，很多人明白了也不说，或者不敢说。因为说这样的话很容易掉进政治不正确的陷阱里去，所以，他们就在种族主义上面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差异来。

他们以关心文化的道貌岸然，玩弄隐喻来歪曲和颠倒所使用的“美丽词语”。首先是将种族向文化移位，断言各种文化是绝对无法对比的；其次，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各种文化不可挽回地相互不可吸收性。直接侮辱、歧视和彻底排斥可以以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价值的名义实施。总之，他们从鼓吹“种



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

这些表面的话语之下，让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的迷惑性更强了，其种族歧视的实质却并未改变。

“照我说的去做，而不要照我做的去做。”郑若麟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些表面词语的内涵，如果我们不理解它所特指的一些内容，就无法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比方说法国有一些青年犯罪非常严重，而这些青年都是阿拉伯人和黑人。黑人青年和阿拉伯人就是犯罪的同义词，这明显是一个种族主义言论，害怕政治不正确的媒体也不敢这么报道，他们就开始换了一个词——郊区青年。

阿拉伯裔和非洲裔的青年因为贫穷，大多数住在巴黎郊区。所以，在法国媒体上，郊区青年其实是一种特指，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包括白人、黑人、犹太人、亚裔的一个宽泛概念。已经离开法国七八年的郑若麟感慨，“法国的语言变化让他对某些词语的定义也变得不太清楚了”。

事实上，只要我们承认价值多元化是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建立在个体价值差异基础上的“偏见”——无论是关于种族，还是关于阶级、文化、职业、风俗习惯、衣食住行乃至其他方面的“偏见”应该说就永远无法消除，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不应该被消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今，西方社会右翼政党、民粹派别纷纷崛起，如何防止这种“偏见”被“组织”起来，如何反对新意识形态之下的种族主义，对日趋撕裂的整个西方社会而言，这是一道难解的命题。✎